

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于亚娟，田志馥
(内蒙古财经大学 旅游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南宋福建庙学分布非常广泛,不仅沿海平原,而且汀州、漳州的山区也遍及庙学。依据庙学分布情况,可将福建分为庙学发达区、一般区及落后区。从空间分布角度观之,南宋福建庙学呈现出规则架构、主要分布于自然流域及河谷地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区域性、人口数量及地域开发等因素影响着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布局。

关键词：庙学;时空分布;南宋;福建
中图分类号：K245;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4)01-0142-06

庙学是孔庙与学校合而为一的建筑,孔庙承担祭祀职能,学校承担教学职能。关于宋代福建庙学,学界已有一定研究,如周愚文^[1]、刘海峰^[2]、黄新宪^[3]等从教育史视角对此深入探讨。目前为止,尚未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南宋福建庙学发展一度掀起高潮,倘若从空间分布角度开展研究,显然有助于全面勾勒福建庙学发展及分布图景。本研究正是立足于此,探讨南宋福建庙学的地域扩展态势、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丰富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拓展福建地域文化研究视角。

1 南宋福建庙学地域扩展态势

南宋福建庙学发展大致经历前后两个时期(图1)。图1显示,南宋前期福建共有庙学52所,其中,宁化、德化、连城、长汀、邵武、兴化、长泰、晋江、莆田、政和庙学是这一时期所建。这表明南宋前期汀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庙学得到进一步开发,尤以汀州为甚;晋江流域和木兰溪流域的庙学分布不仅紧凑,而且深入到内陆山区——德化、兴化;漳州和邵武军各增加1所庙学,与其时整体区域开发相呼应。

南宋后期福建共有庙学57所,其中,武平、上杭、泰宁、福安、剑浦庙学为这一时期新建。这表明,南宋后期福建庙学空间分布更为均衡:汀州新增2所庙学,缩小了与福州、泉州等地的差距;闽北地区也不甘示弱,新增泰宁、剑浦庙学;福安庙学的设置使得闽东地区的庙学由沿海平原延伸至内陆山区。福建县级庙学覆盖率至此高达100%。依据图1可以绘制出南宋福建新建庙学一览表(表1)。

收稿日期：2012-12-10；**修回日期：**2013-12-18
基金项目：2012年福建省教育厅A类人文社会科学项目(JA12504S)
作者简介：于亚娟(1979-),女,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讲师,主要从事文化资源、历史文化地理研究,(E-mail)nmg1207@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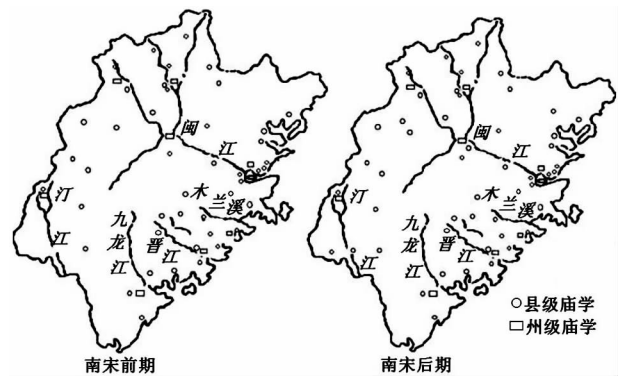


图1 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mple-Schoo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Fujian

表1 南宋福建新建庙学一览表
Tab.1 The number of new constructed Temple-Schoo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Fujian

地区	福州	泉州	兴化军	南剑州	汀州	邵武军	漳州	建宁府
数量/所	1	2	2	1	5	2	1	1
占比/%	6.7	13.3	13.3	6.7	33.3	13.3	6.7	6.7

综合图1和表1,可以勾勒出南宋福建庙学的地域扩展态势,并且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并未对福建庙学发展产生根本性的破坏,福建庙学持续发展。从行政区划看,各地均有庙学始建,所占比重从6.7%~33.3%不等。从自然流域看,闽江流域、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九龙江流域及汀州流域均新建庙学,而且,庙学分布逐渐向内陆延伸。

第二,汀州变化非常显著,新增5所庙学,所占新建庙学比重高达33.3%,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考虑到南宋汀州辖6县,足可以看出汀州庙学发展速度之迅猛。而且,始建庙学散布汀州南北,空间分布也较为合理。

第三,在西部山区庙学发展的同时,东部沿海庙学并未停滞不前。福安庙学的设置就是明证。再如,庙学

比较发达的兴化军在高宗朝时新建了莆田、兴化庙学。所以,在看到庙学分布差异缩小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地域差异性的存在。

2 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

如上述所,南宋福建庙学持续发展,但是地域差异性仍然存在。本研究拟以南宋后期庙学发展情形作为南宋福建庙学发展的代表,据此绘制表 2,分析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差异性及由此造成的区域梯度差异。

表 2 南宋福建庙学分布信息
Tab.2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le-Schoo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Fujian					
统县 政区	庙学数 量/所	人口数 /万户	地域面 积/km ²	庙学人口比/ (所·万户 ⁻¹)	庙学地理密度/ (所·万 km ⁻²)
福州	14	33.424 0	24 108	0.419	5.807
泉州	8	25.575 8	12 936	0.313	6.184
漳州	5	11.201 4	18 620	0.446	2.685
汀州	7	15.033 1	19 404	0.466	3.608
建宁府	8	19.713 7	19 012	0.406	4.208
南剑州	6	15.708 9	18 816	0.382	3.189
邵武军	5	21.295 1	8 428	0.235	5.933
兴化军	4	6.488 7	4 508	0.616	8.873

2.1 数据来源

2.1.1 人口数据的采用。南宋政府苟且东南,无力进行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所以,史籍中有关人口的统计显得不够科学,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均衡,而且错漏不少。吴松弟认为,《宋会要辑稿》所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的数据可以做到大致可靠。《文献通考》所载嘉定十六年(1223 年)户数最为完整,而且,马端临是宋元之际人,能够看到南宋后期的各种户口数,因此,这一数据相对可信^[4]。遗憾的是,这两种史籍均没有统县政区的户口数,成书于明代的《八闽通志》则有。对比这 3 种史籍的数据,发现《八闽通志》的总户口数是 145.869 6 万户,居于《宋会要辑稿》^[5](139.056 6 万户)和《文献通考》^[6](159.921 4 万户)之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福建通史》第三卷关于南宋人口数也是采用这一数据^[7]。因此,本研究人口数据以《八闽通志》为准。

2.1.2 地域面积的计算。南宋福建各统县政区的区域面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南宋福建地图为基础,运用网格求积法而得。所谓网格求积法,即采用透明方格网纸覆盖在测量地图上,先计算出图形内完整方格数,然后,将不够整格的部分用目估方法折合成整格数,两者相加乘以每格所代表的面积,即得到地图面积。然后,根据地图比例尺进行换算。通过这种方法得知南宋福建所辖面积共 125 832 km²,与《宋代户口》所载福建面积 127 326.09 km²^[8]相差无几。另外,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福建行政区的变迁相对稳定,宋代福建区范围与今福建全省相当^[4]。今福

建所辖面积累加是 122 601 km²^[9],这与网格求积法所得结果也大致接近。

2.2 分析与结果

2.2.1 分析。庙学设置的前提是县级政区的建置,福建县级庙学的设置具有及时性^[10],即新县设置不久就始建了庙学。统县政区的庙学数量与其所辖县数量直接相关。一般来说,一个县仅有一所县级庙学。因此,单纯对比统县政区的庙学数量对于研究其地域差异是毫无意义的,必须引入庙学人口比、庙学地理密度指标。

庙学人口比指庙学数量与统县政区人口之比,反映了每万户人口拥有庙学的数量。庙学设置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一定程度上讲,二者似乎呈现出正相关的现象^[11]。通过比较统县政区庙学人口比,可以反映统县政区的庙学空间分布情形。

庙学地理密度指庙学数量与统县政区地域面积之比,反映每万平方公里所建庙学的数量。县级政权的设置与其辖地面积有直接关系,因此,庙学设置也与地域面积密不可分。通过对庙学地理密度比较分析,可以有效判断庙学的地域分布情形。

本研究拟通过庙学人口比、庙学地理密度构建庙学地域分布指标体系,分析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做法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分别将上述指标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减,所得值平均分为四等份,据此,将南宋福建统县政区分为四类:依据庙学人口比划分,第一类(0.235~0.330)包括泉州、邵武军;第二类(0.330~0.426)包括福州、建宁府、南剑州;第三类(0.426~0.521)包括漳州、汀州;第四类(0.521~0.616)包括兴化军。依据庙学地理密度划分,第一类(2.685~4.232)包括漳州、汀州、南剑州、建宁府;第二类(4.232~5.779),无此类统县政区;第三类(5.779~7.326)包括邵武军、泉州、福州;第四类(7.326~8.874)包括兴化军。

第二步,将上述 4 类统县政区分别计 1 分、2 分、3 分、4 分,然后将各统县政区所得分相加,计算总分,如表 3 所示。

表 3 南宋福建统县政区庙学分布参数
Tab.3 The distribution parameters of

Temple-Schoo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Fujian					
统县 政区	庙学人口比		庙学地理密度		总分
	类别	得分	类别	得分	
福州	第二类	2	第三类	3	5
泉州	第一类	1	第三类	3	4
漳州	第三类	3	第一类	1	4
汀州	第三类	3	第一类	1	4
建宁府	第二类	2	第一类	1	3
南剑州	第二类	2	第一类	1	3
邵武军	第一类	1	第三类	3	4
兴化军	第四类	4	第四类	4	8

2.2.2 结果。据表 3 可将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区域分为 3 个等级:总分介于 5~8 为第一等级,即庙学发达区;总分为 4 为第二等级,即庙学一般区;总分为 3 为第三等级,即庙学落后区。可见,南宋福建庙学发达区包括福州、兴化;庙学一般区包括泉州、漳州、汀州、邵武军;庙学落后区包括建宁府、南剑州。

3 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特征

3.1 各流域遍及庙学, 总体呈现不规则架构

与行政区域不同,自然流域有一个容易划分的边界。而且,“水体提供了地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流域系统地安排了资源(诸如土壤与植被)模式”^[12],所以,流域划分原则在区域地理学中被视为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应于历史地理学。

“福建内部的自然区划以纵贯南北的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中轴线形成沿海与内陆两大亚区”^[13],与几大河流相互交错,形成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木兰溪等流域。从这一角度观察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发现,各流域遍及庙学。

最显著的变化在汀江流域。北宋时上四州^①一部分庙学沿闽北南浦溪、建溪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止于南剑州沙县,汀州流域县级庙学仅有一所;经过南宋经略,汀江流域庙学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宁化、连城、长汀、武平、上杭、泰宁相继建学,改变了闽西庙学稀疏的格局。这说明汀江流域庙学普及速度惊人,与南宋时人口增长速度几乎类似。

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庙学发展也引人注目。长泰、晋江、德化等地庙学的建置,使闽南庙学发展进一步均衡化,而且也深入到内陆区域。闽东南沿海的庙学空间分布更趋广泛。

其他诸如木兰溪、邵武溪、长溪等流域分别建置莆田、邵武、福安等庙学。这些庙学与前述庙学共同改变了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看,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布局呈不规则架构。

3.2 庙学主要分布于自然流域及其构成的河谷盆地

从图 1 可以看出,尽管庙学广泛分布于八闽境内,但是附着流域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庙学的官方性格决定了庙学的兴建与行政区划的调整紧密相关,庙学的设置既是地域开发的结果,也是行政单位设置的表现。从这个意义讲,庙学的地域分布就是行政区划特别是县级行政区划地域分布的反映。

宋代福建县级行政区划主要集中于自然流域以及河谷盆地。这与移民路线、地域开发难易程度不无关联。自然流域及其构成的河谷盆地便于灌溉,土壤肥沃易于垦殖,“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14]。与之相比,闭塞的山区以及较偏远的沿海地区难于开发,析置县级政区的动力不足。如归化、寿宁、永定、永安、大田、宁洋、

漳平、平和、招安、海澄等设置于明代。至清,复升龙岩、永春二县为州,福宁州为府,又置云霄厅和福鼎、屏南二县。这些新设政区几乎全在闭塞的山区和较偏远的沿海地带^[15]。如此,宋代庙学总体上分布于流域及其构成的河谷盆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3.3 从空间分布区域来看, 梯度差异显著

庙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明显,大体上构成 3 个梯度区域。

第一梯度包括福州和兴化军。南宋时福州仍然是第一梯度的组成部分,延续了庙学发展核心区的地位。兴化军“自常袞入闽之后,延礼英俊,儒风大振。有齐鲁遗风……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16],及南宋时庙学持续,跃居为第一梯度之列。

第二梯度包括泉州、漳州、汀州和邵武军。南宋时汀州和邵武军庙学发展很快,从空间分布看,两地庙学覆盖率显著提高。随着移民渐入闽南地区,南宋时漳州开发力度加大,庙学随之发展。泉州庙学变化令人感到意外,南宋泉州非常发达,泉州港据其时三路市舶之一,但其庙学发展水平却居于第二梯度,原因或许在于泉州人口激增而导致庙学人口比下降。

第三梯度包括建宁府和南剑州。这两个地区北宋时庙学处于相对发达区,南宋时却降至第三梯度,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其一,这两个地区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地方,其庙学发展在北宋时即达到一定程度,发展余地不足,以致南宋被其他地区赶超;其二,南北宋之交,大量北人南迁。由于沿海、沿江一带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区域人口逐渐膨胀,后迁入移民不得不向闽西、闽北拓展^[17]。庙学人口比因之而下降;其三,南宋闽北多次都受到战乱冲击,“比年建、剑、临汀、邵武四郡,为群凶焚劫,荡尽无孑遗存”^[18]。这势必影响教育的正常发展。

4 南宋福建庙学时空差异之主因

4.1 地理环境

任何事物的生成、发展都无法脱离地理环境,并无可回避地受其制约。福建庙学亦然,这主要从地理位置、内陆山地与沿海平原迥异两个方面来体现。

在今天看来,闽北山区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东南平原地带,但是,宋代闽北却是福建交通发达之地区。据研究,当时共有 3 条陆路与外界相通:一是杉关路,从邵武出杉关入江西,地势平坦;二是分水关路,由崇安至江西铅山界,为闽赣孔道;三是仙霞岭,由浦城北上,路线最短^[19]。便利的交通条件使闽北人员特别是文人仕子往来频繁,或多或少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南宋建宁府沦

^① 宋代福建大体上以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界分为闽西北山区和闽东南沿海两大地理区域,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位于山区,习惯上称之为“上四州”;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位于沿海,习惯上称之为“下四州”。

为第三等级,要辩证来看,一方面是其北宋发展迅速,基本涵盖所有区域,发展空间不足,这本身说明了北宋时建州庙学发展之出色;另一方面是南宋时地域开发已经深入到闽西、闽南山区,闽北失去了之前的地理区位优势,以致不进则退、后来者居上。

反观下四州,负山滨海为其主要地理特征。所负之山多是丘陵也有高峻之山岳,这就孕育了丰富的河流。闽江、木兰溪、晋江、九龙江横贯下四州,形成冲积平原。这意味着两个意义:一方面,平原土壤粗松肥沃适宜耕作。“海退泥淤沙塞,瘠鹵可变膏腴之类”^[20],冲积而成的土壤利于农作物生长,必然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吸引并供养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因势利用充沛水力资源,修建水利工程。美国学者德怀特·希尔德·帕金斯根据同治版《福建通志》第33—37卷统计了宋代福建兴修的水利工程,表明当时水利工程多达324处,其中,241处集中于东南部沿海平原^[21]。这些水利工程中不乏成效显著的,如长溪营田陂、福清苏溪陂、龙溪广济陂、晋江六里陂、莆田木兰陂等。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为沿海平原人口增长提供物质基础。这两个方面毫无疑问都加强了东南部沿海平原的经济实力,加上精耕细作,南宋滨海狭长的平原地带成为福建经济发达区域。其庙学分布也因之处于全路先列。

4.2 经济地域性

福建境内山峦叠嶂,河流蔓延,丘陵与河流交割,将福建分为若干个小经济区。不同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农业经济来看,福建耕地不足,南宋时粮食供应不容乐观。“本路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糶”^[22],反映了其时福建农业不发达境况。具体到各地情形却各不相同,大致分为三类: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为第一类,因山间盆地垦殖系数高,山地丘陵多开荒种粮。这类地区粮食自给有余,种茶、林木等农副业在农业结构中占有一定比重;福州、泉州、兴化军为第二类,平原地区利于农业生产,粮食产量高,但是人口稠密使得人地矛盾特别突出,往往需要从外地调入粮食以供应所需。这类地区的农业经济除了粮食生产外还发展果木栽培、水产养殖,农业经济发达;漳州、汀州为第三类,地域开发不足,农户基本处于普遍贫穷状态。这类地区农业结构单一,粮食勉强自给。这三类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各地办学的能力。因为宋代地方庙学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学田,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负担。各地经济条件不同自然会影响拨给学田的能力,进而影响庙学的发展及时空分布。

从商贸经济来看,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倒逼福建商业的兴起。关于宋代福建商品生产、商业贸易等内容,吴松弟^[23]、彭友良^[24]已有相关研究。本研究拟另辟路径,即通过墟市分布来衡量其商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墟市是农村定期进行实物交换的场所^[25]。墟市的

空间分布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区域商业差异。根据《宋代草市镇研究》^[26]及《八闽通志》^[27]绘制出南宋福建墟市的分布情形(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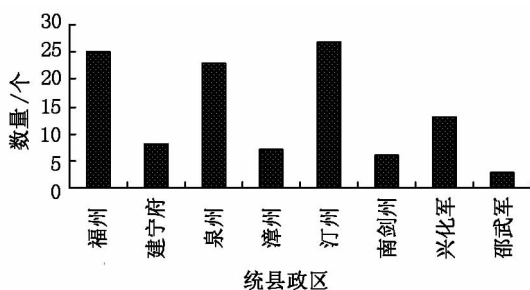


图2 南宋福建墟市分布

Fig.2 The quantity of market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Fujian

由图2可知,汀州墟市数量最多,这正说明了南宋汀州庙学发展迅速。因为墟市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一些水陆交通要道的墟市将会有更多人口定居,逐渐发展为新的市镇,甚至发展为新的县。“南宋时期,由堡升县仅连城堡一个,因为连城的商业墟市贸易相当繁荣,是闽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流中心”^[28]。新县的设置必然会促进庙学的兴建。汀州处于闽、粤、赣交通要道,水路通过汀江可通航梅县、潮州,至汕头入海,陆路直通赣南、虔州等地。其商贸勃兴促进地域开发,进而增设新县,因此,南宋汀州庙学的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变化。

4.3 人口数量及地域开发

关于庙学分布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如周愚文所言:“州县学校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东南地区),正好也是宋代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因此,在未找到确切证据否定两者间不具有任何关系存在之前,对于人口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实不宜忽视”^[1]。上述论断不无道理。福建长期地广人稀。唐代天宝年间,全省境内人口仅90 686户^[29]。唐以来随着移民渐入,人口剧增。移民路线分水、陆两路。水路主要目的地是福州和泉州,陆路以闽赣、闽浙交界地为通道,目的地主要是建州、邵武^[30]。因此,唐末宋初,福州、建州是福建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庙学的空间分布实际上就是这一发达景象的教育表征。

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入闽移民持续不断。大量移民对福建社会经济面貌产生了重要影响。福州成为“东南一都会”^[31],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32]。偏远山区人口数量也有了很大增长。南宋时福建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移民首先进入的闽北山间盆地、闽东南沿海平原。“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地无地力”^[33]。作为一种自发的调节方案,汀州、漳州等山区成为新移民的目的地。移民的自发调节有利于人口的合理配置。一般来说,自然条件好、经济开发早的地区人口相对稠密,人口增长率也较为稳定。但随着人口

增长,土地开发相对滞后,人均耕地必然减少。人地矛盾因之出现。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会自觉迁往地多人少的地方,新的移民也顺应此潮流,流向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分布更为均衡、合理。

入闽移民的路线及各地人口数量的变化本身是地域开发进程的表现。福建地域开发大致呈现闽北→闽东→闽南→闽西的过程。福建比较规模大的开发是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其时一部分汉族移民带着中原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从闽江上游入闽,闽北山区成为第一个开发地区。闽东、闽南开发迟于闽北,但发展迅速。闽东福州处于闽江出海口,因之孙吴为发展水军而格外重视对其经营。闽南开发比闽江流域更晚,但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及航海活动的开展,很快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美国学者贾志扬论述到:“在晚唐及随后的闽王国时期(879—978年),它受益于持续的外来移民,成为重要的农业区,而且由于泉州而作为主要对外贸易中心脱颖而出”^[34]。到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增置市舶。泉州在全国商业城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开封、杭州^[35]。闽西是开发最迟的地区。北宋时,虽然州治所在地的文化层次不低,但总体上的开发程度远低于其他六州。至宋室南渡尤其是蒙古铁蹄触及四川,才有大量移民进入该地。以长汀为例,太平兴国初人口密度仅1.4户/km²,南宋由于移民迁入,人口增加很多,仅隆兴二年(1164年)的户数便比元丰三年(1080年)增加114.2%^[4]。不过,南宋时汀州、漳州地域开发力度较大也仅是针对北宋而言,事实上,这二地还有很多未开发的空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徭寄之扰,象曾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36]。“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数”^[37]。

地域开发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行政建置。行政政区的设置有经济、政治、军事、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但人口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绝不能仅仅依靠本地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殖”^[38]。对于宋代福建地域开发而言,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宋代福建共增设10个县,其中,怀安、福安、惠安属于沿海地区,崇安、政和、光泽、上杭、武平、清流、连城均属闽北、闽西山区^[17]。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县级政区的增设必然引起庙学的设置,因此,南宋时汀州庙学的空间分布变化最为显著。

5 结论

从动态的角度看,南宋福建庙学持续发展,广度上体现为境内五大流域遍及庙学,县级庙学覆盖率达至100%,深度上体现为覆盖区域由沿江沿海拓展至内陆地区;从静态的角度看,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架构不规则,庙学主要分布于自然流域与河谷地带,而且,区域梯度差异显著。

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受到一定机制制约。一言以蔽之,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人口数量、地域开发是这个

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南宋福建庙学出现上述地域扩展态势、分布格局及特征。

参考文献:

- [1] 周愚文. 宋代的州县学[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
- [2] 刘海峰,庄明水. 福建教育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 [3] 黄新宪. 闽台的庙学规制探略[J]. 教育评论,2000(2):61-64.
- [4] 吴松弟. 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5] 徐松. 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六十一册食货六九[Z].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7:6365.
- [6]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Z].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6:117.
- [7] 徐晓望. 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87.
- [8] 袁震. 宋代户口[J]. 历史研究,1957(3):9-46.
- [9] 刘锡涛. 宋代福建人才地理分布[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12-116.
- [10] 林拓.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52.
- [11] 周愚文. 宋代的州县学[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129.
- [12] 阿兰·R. H. 贝克. 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M]. 阙维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86.
- [13] 林拓. 福建县级政区建置的地域分异及其整合过程——兼论自然区与行政区的关系[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1,20(3):34-38.
- [14] 方勺. 泊宅编:卷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5.
- [15] 林汀水. 福建政区建置的过程及其特点[C]//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历史地理:第十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26.
- [16] 黄仲昭. 八闽通志:卷三地理[Z]. 修订本.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67.
- [17] 林国平,邱季端. 福建移民史[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43.
- [18] 杨时. 杨龟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与执政[M]. 影印本.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941.
- [19] 林拓.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66.
- [20] 梁克家. 三山志:卷十二书籍类三[Z]. 校注本.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139.
- [21] 德怀特·希尔德·帕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M]. 宋海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51-469.
- [22] 黄淮,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七荒政[Z].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243.
- [23] 吴松弟. 宋代福建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及其与地理条

件的关系[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82 - 87.

[24] 彭友良. 宋代福建商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J]. 福建论坛,1988(1):61 - 65.

[25] 谢肇淛. 五杂俎:卷三地部[Z]. 校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59:89.

[26] 傅宗文. 宋代草市镇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529 - 534.

[27] 黄仲昭. 八闽通志:卷十四至十五地理[Z]. 修订本.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8] 唐文基. 福建古代经济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326.

[29] 刘昫.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M]. 标点本.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989 - 991.

[30] 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42.

[31] 蔡襄. 端明集:卷二十八福州修庙学记[O]. 四库全书本.

[32] 王象之. 輿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981.

[33] 祝穆. 方輿胜览:卷十二福建路泉州[M]. 点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3:214.

[34] 贾志扬. 宋代科举[M].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220.

[35] 马润朝. 宋代的商业与城市[M]. 马德程,译.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3.

[36]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M]. 点校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626.

[37] 叶适. 叶适集:卷十漳浦县圣祖殿记[M]. 点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2010:179.

[38]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发展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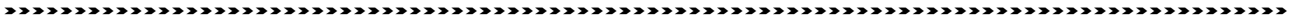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Fujian Temple-Schoo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u Yajuan , Tian Zhifu

(Tourism Institute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Hohhot 010070 , China)

Abstract: Temple Schools were around all over Fujian because of its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the Temple School distribution was unbalanced, and was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emple School developed area, general area, backward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it showed irregular framework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gradient. Further researches suggests that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ujian Temple Schools space layout is in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 environment, economic region, popul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mple School;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ujian



欢迎订阅《地域研究与开发》

《地域研究与开发》杂志是由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学综合性学术刊物,1982 年创刊。该刊主要刊载地域研究与开发方面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栏目有:重大问题专论、理论与方法、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区域开发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研究、农业研究、旅游研究、环境研究、地图与遥感研究、历史地理与环境考古研究等。读者对象主要是地理科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本刊为双月刊,国际标准大 16 开本,176 页,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统一刊号 CN41 - 1085/P,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3 - 2363,邮发代号 36 - 109,期价 20 元,全年价 120 元。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到各地邮局订阅或直接汇款到编辑部订阅。

联系人:张红
联系电话:0371 - 67939201
E-mail:yj kf@ vip. sohu. com
地址:郑州市陇海中路 64 号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域研究与开发》编辑部
邮编:450052